



2012年卷

主编 李佑新

毛泽东研究

MAO ZE-DONG RESEARCHES

湘潭大学出版社

主编 李佑新

毛泽东研究

MAO ZE-DONG RESEARCHES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研究. 2012 年卷 / 李佑新主编. —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81128-470-6

I. ①毛… II. ①李…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集
IV. ①A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9601 号

责任编辑：朱春花

封面设计：胡 瑶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1-5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xtup.xtu.edu.cn>

印 刷：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0

字 数：37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470-6

定 价：40.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目 录

本刊特稿

-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石仲泉(1)

毛泽东实践哲学研究

- 毛泽东实践思想本质再思考 欧阳英(22)

- 简论毛泽东的实践思维方式 王文兵(34)

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 从价值评价论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看 孙伟平(40)

- 关于客观评价“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思考点滴 唐正芒(49)

- 《矛盾论》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沧南 彭臻(55)

- “非毛化”论调的逻辑谬误分析 王向清 石福梁(65)

毛泽东党建思想研究

- 毛泽东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唐洲雁(72)

- 中国共产党对待毛泽东思想科学态度的形成 高其荣(8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建构理想与现实的合理张力：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及其当代

- 发展 李佑新(96)

- 论党的建设科学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关联 齐卫平(99)

调查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熊 辉 吴 晓 谭诗杰(108)

早期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与中国国情的探索 周锦涛(115)

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及其根源 杨小军 陈 颖(122)

青年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 钟利琼(127)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

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意义 李 吉(133)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讨 张海燕 郝 仪(141)

一部“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

——读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刘华清(148)

1917—1918 年毛泽东探究“大本大源”的历程 龙剑宇(158)

蔡和森对五卅运动的历史贡献 李永春(168)

略论 1957—1966 年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观 刘金如(176)

毛泽东与国民党

——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视角 刘志靖(181)

名家访谈

宽广视野 求实精神 独立人格

——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许全兴谈治学之道 本刊记者(189)

研究综述

2011 年国内毛泽东生平和事业研究综述 黄 俊 吴 静(207)

论点摘编 文兵 显中 正芒 锦涛 陈龙 吴静 晨力 黄俊等(226)

文献篇目辑览

2011 年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重要篇目辑览
..... 蒋菲 王迪 马炯 林靖(246)

2011 年毛泽东研究著作辑览 蒋 菲 王 迪(290)

2011 年毛泽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篇目辑览 周金华(294)

2011 年毛泽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篇目辑览 周金华(304)

2011 年毛泽东研究英文文献(部分) 陈 龙(307)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311)



本刊特稿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石仲泉*

1

今年是延安整风运动 70 周年,我在参与写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过程中,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有所了解。目前的党史出版物,对延安整风运动大多数是正面论述和评价的,但个别出版物和坊间议论对此加以贬斥的也不少。有的甚至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权力斗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文革”运动,等等。我以为,这些观点将延安整风运动妖魔化了。这里,根据我所知道的历史资料谈点个人看法,作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纪念,也对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作些评价。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缘起

应当怎样评价延安整风运动呢?它涉及毛泽东的理念与动机、整风的目的与要求、发动的远因与近因、运动的主流与支流、认知的本质与表象等诸多问题。对有些史实,站在不同立场、持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会作出不同解读,其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但是,我们应当努力还原历史,说明延安整风运动的真正原委,把握它的本质,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延安整风运动为什么会产生?这要从党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背景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里诞生的。她走过了一段异常曲折复杂的道路。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很不容易。一是对中国实际情况

* 作者简介:石仲泉(1938—),男,湖北红安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主要致力于中共党史的研究。

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二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给中国共产党许多积极的东西，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造成许多困难。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与这有关系。在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困难。中国共产党还要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才产生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这种教条主义倾向并不是到 1938 年就止歇了，它在党内的思想影响一直存在，并没有完全消失。

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出发，也就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这个问题要解决。在当时，不经过全党整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从而懂得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能取得胜利，而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遭受挫折。这样双管齐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全党认识，统一思想。这是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始动机。

关于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早在 1938 年 10 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已经开始强调。他要求全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1939 年 5 月，他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大党，就要有大批的有马克思主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就非学习不可。要在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大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会后，中央一些部委组织了学习小组，在延安参加学习的干部达到四千多人。

但是，那两年的学习运动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与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认识有关。在 1940 年 12 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分析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错误问题。他说：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作修改。



但是，会上对此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开展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在1941年发动整风运动，也与皖南事变有密切关系。这一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损失惨重。这使毛泽东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在前述的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对项英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怎么认定，党史界有不同看法还可讨论。毛泽东基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认识，从3月开始，连续采取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有两个。一是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将前些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他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实际上是为整风学习作舆论准备。二是在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作整风学习的动员。他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讲话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严厉，情绪之激动，是此前许多人从未感受过的。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应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毛泽东是胸怀中国革命大局的。上述发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也可视为整风运动的远因和近因。显然，这完全是为了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我翻阅了不少档案，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事实



上，在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解决。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

二、中央领导层的整风

过去的党史书讲延安整风运动，都只讲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一般干部和广大学者基本不知道还有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学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披露了这个问题。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犯的思想错误最顽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他还认为，对于不同的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有所不同，但两个层次的整风有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开始的，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后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中央一级高级干部的整风，主要是通过 1941 年和 1943 年的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的。

（一）关于 1941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这次整风会议从 9 月 10 日至 10 月 22 日，前后持续 40 多天，其实只开了 5 次会。毛泽东在第一天会上作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表现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因为他们自称“国际路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认为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根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某些思想的影响和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是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 16 条办法，其基本精神是：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



主义；要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组织方法论研究小组，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在延安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政治局同志都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在中央整风的 5 次会议上，有 28 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与会者对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进行研讨，分析了部分文件的一些情况。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沉痛检讨。

张闻天第一个检讨。他两次发言说：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是路线错误。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实际情况。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会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 1942 年 1 月至 1943 年 5 月，他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调查了近一年半时间。

博古也两次发言检讨。他说：1932 年至 1935 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应负更多的责任。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王明、稼祥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过去长时间对错误没有认识，这次学习会检查，感到十分沉痛。但是，我有勇气研究自己的错误，克服这些错误。

王稼祥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的，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读到这些发言我感慨良多。现在不是讲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吗？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呢？我以为，这种勇于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的精神就是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表现，就是中华民族先锋队战士无私无畏崇高



品质的展示。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一些领导人涉世稚浅,没有经验,没有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革命是在摸索着前进。有摸对了的,也有摸的不对的。没摸对,犯了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应当检讨,总结教训。这是忠诚革命的表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领导同志犯的错误也为寻找正确的革命方法和道路积累了经验,亮了红灯,此路不通,另辟新径,这也是贡献。就他们个人而言,只要认识了错误,愿意改正错误,就还是党的中坚英杰,就应当同样受到尊敬。

这次会议的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在评价六届四中全会方面,大家分歧较大。有的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的批评态度。王明两次发言都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人,与他本人没有关系。他还对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担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近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地进行了批评,唯独不说自己有什么政治错误。他的这个态度引起与会者很大不满。会后,毛泽东同其他人一起找他谈话,他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目前不能同蒋介石闹摩擦;与国民党的关系,应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他还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这以后,王明称病,既不参加政治局会议,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尽管如此,中央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1941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受到王明的干扰,但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开展全党性整风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二)关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由于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认为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1943年“九月会议”在继续深入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这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参加扩大会议的人数更多。

这次整风会议大致分三个阶段,主要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对王明的路线错误展开批判;其他同志发言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这次整风会议正处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反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成为主要倾向。这一历史背景反映到党内斗争上,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和内容上虽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比上次会议要尖锐许多,有不少偏激之词,会议的空气有时很紧张。



第一阶段会议,从9月7日到10月6日,其间开了三天会。博古发言:同意毛主席说的抗战时期存在路线问题,一条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今天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朱德总结了在党领导下近二十年来的经历,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错误。他说:王明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搞独立王国的特点。朱老总回顾自己的历史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时虽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态,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他很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读的书不比别人少,且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我们这次学习,就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他的这番讲话,对于把全党认识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主义宗派,一是经验主义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主义宗派的代表人物最主要的是王明,然后是博古。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他也指出,对于教条主义宗派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错误的。欢迎犯过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关于经验主义宗派,他认为,他们的大多数是正派人,像张国焘那是邪派人。在两个宗派中,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要的,他们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吓人,与经验主义宗派中的不正派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还说:教条主义宗派是头,经验主义宗派是脚,教条主义宗派是经验主义宗派的灵魂,反对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主义宗派开始,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



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这次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此后，过去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第二阶段会议，从 11 月 13 日至 11 月底。毛泽东首先讲话，说遵义会议没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当时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力拿过来了。前年“九月会议”之前没有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

这一阶段的重头戏是周恩来的发言。前年的会议他没参加，这次从重庆回延安就是参加整风会议。他经历过党内许多重大事件和变故，检讨党的历史，批判两个宗派，不能不感到会议的分量。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投入整风学习，用半个月时间，写了 4 篇共五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二阶段会议开始后，仅发言提纲就写了两万多字。他的发言是中央两次整风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大部分，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 1927 年大革命后期党的五大他参加政治局工作讲起，一直讲到 1943 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这个历史回顾实际上成了 1927 年以来的党史报告。

周恩来严于律己，努力按照整风文件要求，并根据毛泽东讲的“两个宗派”思想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在会议期间，他被看做经验主义宗派的主要代表。他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 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诚恳地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同时，在工作中要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才能做出一点成绩，才能真正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少犯错误；也才能真正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

王明请病假一直没有到会，最后由他夫人孟庆树代笔，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写了检讨信，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宗派错误。

第三阶段会议，在 1944 年开春以后，从 2 月下旬直到 5 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一阶段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开始纠正前一阶段会议的一些缺点。2 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 5 个问题的认识。（1）王明博古错误不是党外问题，而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



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共同工作;(4)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凡做得对的,都应承认。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对上述问题作了阐释。择其要点:(1)弄清思想与宽大结论。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作宽大些。(2)不要否定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与博古等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都要搞土地革命;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我们的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是不好的偏向。要分析,不要一概否定。(3)六大方针。多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虽有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4)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经验主义宗派也没有了。党的历史上的两个宗派,已经不存在了。历史上的问题不是主要的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政治局整风会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的总结。他纠正了会议过程中的偏差,与会同志表示拥护,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看法。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在全会上正式地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上述意见,并形成了决议文字。至此,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圆满结束,同时也宣告从1941年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历经3年,最终以形成全党的空前团结而画上句号。

三、延安整风运动的五大历史功绩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它尽管只有3年时间,但对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它至少有五大历史功绩。

第一,它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具有非

常特殊国情的国度里诞生的。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产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个体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党自诞生时起,就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是科学文化十分落后。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四运动后才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得到比较广泛也比较粗浅的传播。党成立后迅即投入波涛滚滚的大革命洪流,根本来不及认真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连毛泽东那时读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也不多(但他的悟性极高,能从中掌握看问题的方法论,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运用它)。再加上在组织系统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如何搞革命,尽管党的领导者们在努力探索,但主要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这些指示,有的符合中国实际,有的不符合中国实际,革命斗争难免遭受挫折。刘少奇在中央整风学习前夕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①毛泽东在长征到延安后即认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个人发愤苦读;另一方面有如前述,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为了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便发动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研究现实实际和党的历史学习理论。他在准备动员时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②

当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一万多人,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成立的高级学习组,最初是一百多人,后来扩大到 250 到 300 人。全国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由中央管理和指导,延安的高级学习组由政治局和中宣部负责。通过整风运动,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包括高中级干部,这次集中地认真地读了中央规定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毛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0 页。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 年 2 月 28 日、4 月 11 日。参阅《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88 页。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实现这个目标，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它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达到了思想的统一。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问题，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也顾不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过去路线错误的流毒一直存在，影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部分地区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而且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如王明还自视一贯正确，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旧著宣传错误观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批评了他的右倾错误，但1939年5月，他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继续宣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又撰文宣扬1938年他在武汉时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的错误方针。1940年3月，他还把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过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将其当做“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发展还不十分了解的“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因为当时中央准备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他又在制造舆论，抢占先机，夺取“制高点”。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发展，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问题，就成为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3套历史文献。先是在1941年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它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间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多万字。接着又根据整风会议上许多同志的要求，在1942年初编辑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的党史资料书。它主要汇集了从党的一大开始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等，共收文献184篇。还有一本《两条路线》，主要是在前两本的基础上进行选编，再增加1942年和1943年的20篇，共收录了137篇文献的一本关于党的路线问题的专题学习材料。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开始就是编《六大以来》。他自始至终



参加了 3 本书的编辑工作。这 3 本书出版后，在党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方面，许多同志了解了党的历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布过许多“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回忆那段历史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改正错误，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1943 年 10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杨尚昆回忆看了那些材料说：“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武器。”^①

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央以两次“九月会议”为代表的整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形成了共识。它的主要结晶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简明概要地叙述了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通过同毛泽东的政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讲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问题，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没有讲“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 100%、苏区损失 90% 的问题，也没有讲抗战以来的历史是非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建国。毛泽东说：这些不讲，至多是缺点；讲得过分，讲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采用了这个方针，这次还坚持这个态度，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决议通过后，博古很感动地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上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博古的感言，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第三，它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联为一体，虽然是 2009 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命题，但这“三化”思想却在党创立之后实际上就已经蕴含着。因为从党的创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是孤立的三个

^①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9 页。